

# 惠州文脉【风物】

## 编者按

在惠州博罗园洲镇田头村，梅花墩窑址于1973年被发现，距今已50年。其间历经两次发掘，出土遗物丰富。这是广东省目前发现时间最早、最先进的一座龙窑，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如今，这一重要的“人文宝藏”却深藏于农田鱼塘，几乎无人问津，当地老百姓也知之甚少。“这里都是农田山地，保护传承需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，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才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！”专家认为，要由政府、市场、民间三股力量来驱动发展，才能实现“在发展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发展”。

(李海婵)



惠州市博物馆《东江流域的文明》展厅，陈列着梅花墩窑址出土文物



梅花墩窑址被农田鱼塘“吞没”

# 梅花墩春秋窑址：岭南东江流域陶瓷重要源头

文脉走访

## 梅花墩窑址被农田“吞没”有待关注

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
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园洲镇田头村发现，农田鱼塘几乎将梅花墩窑址掩盖，在外观上看来与普通农田区别不大。如果无人带领，难以找到。当前，该遗址尚待合理保护、活化利用。

当天，记者在半人高的杂草中翻寻好一阵，才看到文保碑。经过风雨剥蚀，上面的字迹早已斑驳不清。“什么古窑”“这里哪有文物”……记者询问好几个村民是否知道古窑址的情况，却都得到了反问。田头村的村主任冯有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知情人，当年他曾配合考古发掘工作。“那时有大批的考古人员驻村，阵仗很大！”冯有兴回忆当年，仍记忆犹新。然而，现在平日除了干农活的村民，鲜有人寻来。“你认真看看，遍地都是上千年的碎陶片！”现场，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纹路还清晰的碎陶片说。“可惜的是，虽然有历史研究价值，但是没有经济价值，没有受到重视。”冯有兴直白地说道。

博罗古遗址众多，距离梅花墩窑址不过10分钟车程，人们还能看到龙溪银岗遗址公园。如今，古窑场遗址主体是几堆再普通不过的黄土，随处可见散落的陶片。人们难以想象，眼前这一公园，是广东省迄今所发现规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场，还解决了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的“孰早孰晚”的学术争议，并于2002年被公布为省文保单位。

记者实地走访发现，梅花墩窑址、银岗窑址都普遍存在政策资金支持不足、基层文化硬件设施跟不上、群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问题。这也是不少古遗址的缩影。“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，也不是书本，而是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。”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、数字乡村与文旅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、教授、博导吴志才认为，“在发展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发展”是最根本的理念。同时，将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规，立法保护文化。解决好理念、立法两大问题，开展“四化”活动，即有形化、项目化、活动化、产业化，推动文旅创新融合。

吴志才认为，未来的文化市场一定是政府、市场、民间三股力量驱动发展，“这些古遗址原先都是农田山地，保护传承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，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，才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！”如此一来，才能实现政府主导，有情怀有理念的市场参与，民间力量保护传承，充分活化“人文宝藏”。

文/余小伦

博罗梅花墩古窑遗址，是历经考古发掘得以验证的岭南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、以出产几何纹硬陶器为主的核心窑口。

就制作工艺和生产技术而言，该窑器型种类多，生产数量大，产品质量好，在生产工具、纹样、龙窑烧制技术的运用乃至原始青釉瓷的出品等方面，均超越以往的制陶水平。

它在岭南古陶瓷研究中所呈现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化意义，影响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岭南文明状态的重新认识，并证明了百越时期的东江流域已迈入稻作农耕文化的新阶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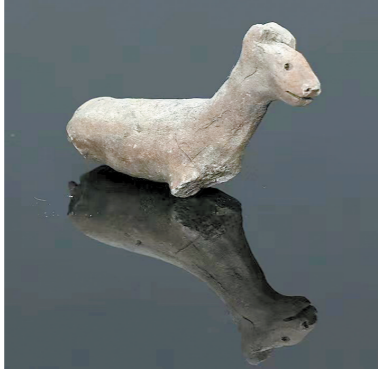
出土文物陶甗 莫树华 摄



纹瓦豆 莫树华 摄



梅花墩窑址出土的陶甗，纹路清晰 莫树华 摄



梅花墩窑址出土的陶羊，由村民捐赠，现存放在园洲镇文化馆 莫树华 摄

### 春秋岭南手工业的“高端制作”

梅花墩古窑所生产的陶、瓷器，是春秋时期岭南手工业“高端制作”的代表，并作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符号之一而载入史册。

古窑陶器器皿的文化内涵，主要以器型和纹式为主。在器型方面，据刘成基教授和杨少祥教授撰写的《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和发掘》介绍，“陶器种类有罐、豆、瓮、釜、碗、钵、杯、簋、盘、壶等”，其中，“簋可分二型。”“(1)型：1件。泥质灰陶。”“(2)型：均残。孤腹，圈足。器表饰夔纹、方格纹、篦点纹和刻划符号。”“鼎足可分三型。”“(1)型：兽蹄形足，足尖内勾，根部有二按窝。”“(2)型：圆柱形足外撇，断面呈圆形。”“(3)型：锥形足。足根部有两个深压的小圆窝，足内侧有一小槽。”《周礼》有曰：“天子九鼎八簋。诸侯七鼎六簋。大夫五鼎四簋。士三鼎二簋。”古越人虽不可能完全照搬《周礼》制度，但古越等级制度反映在器物上的相仿或相似性是符合时代特征的。

在纹式方面，岭南印纹陶的起源与陶器盘泥制器有关，盘泥法因完成制作后陶坯粗糙，痕迹明显有碍美观，故需使用陶拍打平整。多次使用或品质较差的陶拍，其拍面粘连陶泥凸起或碰到硬物凹下，成为“坏拍”，本应废弃不要，但其工匠在未知的情况下依然继续使用，在连续拍打过程中，坯体表面即形成规整纹状“线条”，尽显凹凸或凸状美感。由此，这一“废拍”得以保留并继续使用，这一偶然之失成就了印纹陶时代的到来。在漫长的制陶工艺生产实践中，远古陶匠在“凹”“凸”点状纹的基础上，通过不断实践摸索，衍生发明了云雷纹、方格纹、水波纹，直至繁复精美的夔纹。由此，形成陶瓷历史发展中的独特现象——印纹硬陶的文化标志。

关于梅花墩古窑的现实意义，博罗县博物馆杨爱清作《博罗县古窑址考略》一文写道：“梅花墩春秋窑址的发现，填补了广东无春秋时期龙窑的空白。同时，把广东省龙窑的上限，从晚唐推前到春秋时期，成为广东地区最早的龙窑，也是全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，在广东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1992年4月，被列为博罗县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”

“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现，为研究广东先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，进一步证实，越人的祖先有自己的文化。窑址以及出土器物决不会是外地传入的，是地地道道自身的产物，足以反映自身的文化。同时也说明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比较先进的。”“其次，园洲春秋窑址的发现，填补了我省无春秋窑址史料的空白。根据广东省目前考古史料介绍：在广东，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西周、战国时期的窑址，唯独春秋时期窑址是空白的。而这一时期窑址是否存在，对研究广东陶瓷业历史又至关重要。因为历史不能断线，究竟春秋时期广东的陶瓷业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不前？梅花墩窑址的发现，正好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陶瓷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。”

### 夔纹内涵丰富，以此拓展文创产业

从考古资料可知，约在缚娄国时期，夔纹陶广泛分布于东江流域，东北至龙川，西南至增城、东莞，东南至惠东、海丰，中部在深圳、惠阳。不过，生产窑址至今仅见于博罗梅花墩窑、博罗龙溪银岗窑以及增城金兰西瓜岭等古窑，由此可见梅花墩窑在夔纹陶器分布的特殊地位。

夔纹在中华传统典籍中，是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，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概念。如：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夔，一足兽也……其状如牛。苍色无角。一足能走。出入水即风雨。目光如日月。其音如雷。名曰夔。”《书·舜典》：“伯稽首。让于夔龙。”《说文·夂部》：“夔，神也。如龙一足。”《龙经》：“夔龙为群龙之主。饮食有节。不游泥土。不饮温泉。所谓饮于清。游于清者。”

由于先秦时期岭南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文字，因此，图案便被赋予了社会功能，如不同的器型、不同纹样的陶器局限于不同阶层人物使用，这样既可以区分等级次序，也显示出资源效能“节俭”的状况。此外，夔纹因其“复杂”生动的造型构图，被许多考古专家学者视为脱胎于商周青铜礼器中夔纹的样式，并且属土地聚落族群、部落或国家的图腾标志，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。夔纹陶在东江流域出现的文化内涵，因缚娄国的史实依据，被赋予了“国器”或“缚娄之陶”的概念。

因此，夔纹实乃“百越陶纹”中最具代表性、最经典的样式。就其内涵而言，夔纹样式要比陶器本身更加具有象征意义。梅花墩窑址出土陶片标本以夔纹为多见，在工艺制作上，夔龙纹样的施用既有单一，也重复和组合，十分讲究。

春秋时期的梅花墩古窑，被视为岭南东江流域陶瓷艺术源头之一。建议打造“岭南夔龙”陶瓷品牌。可追溯源头，仿效母本。“岭南夔龙”可以梅花墩古窑出土陶片标本上的图案为原形，通过现代设计技术和手段，使陶器无论在器型还是装饰的审美效果上都达到一定高度，打造成实用与美观兼具的器具。

同时，景德镇湖田窑、浙江龙泉窑、河北定窑、陕西耀州窑、河南钧窑等，都呈现“古窑新烧”的特点。惠州当地可以效法，打造以夔纹为主题的“岭南夔龙”品牌，引领手工业制作领域的潮流，让古老的龙窑重现生机。



村民捐赠梅花墩窑址出土文物

广东为数不多的春秋时期遗址